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产国际以宣传为革命之先导的苏俄经验为标准审视国共两党,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直接指导和有力推进,构成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

重要语境和政治氛围。

代理的原因

1923年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后,以苏俄“宣传先导革命”模式改造国民党,要求建立系统化宣传体系。此时国民党正值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真空期,内部左右派矛盾激化。毛泽东凭借早期革命实践与宣传才能,在复杂政治博弈中脱颖而出。

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参与广州国民党改组工作,同期参与主编《向导》周报。1924年调任上海执行部期间,他表面负责组织工作,实则通过斗争成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实际宣传

核心。1925年汪精卫重组国民政府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影响力上升的窗口期,于同年9月被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宣传工作大为改观

毛泽东上任伊始,针对国民党宣传系统“各自为战”的乱象,迅速构建三级联动机制:开设上海交通局强化中央与地方联络,建宣传委员会统筹全国宣传,立检阅会议监督执行。至1926年5月离任时,已建立涵盖12个省市的统一宣传网络。

1925年12月创刊的《政治周报》,以“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为旗帜,单期发行量突破4万份。毛泽东亲自撰写20余篇政论,开设“反攻”专栏系统批驳西山会议派,其中《〈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成为革命宣传纲领性文献。他同步主持编印5辑革命丛书,涵盖党史、苏俄经验、孙文主义等,构建系统化理论传播体系。

在干部培养方面,毛泽东兼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首创“理论+实践”培养模式。其设计的课程体系,既包含革命理论研修,又设置街头宣传实战,培养了大批专业宣传人才。这种“战训结合”模式,又确保了宣传工作的阶级属性。

开创“党治宣传”新模式

毛泽东将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创造性融入国民党宣传体系,构建起“党治宣传”新模式。他确立“宣传大纲—执行网络—效果评估”的闭环系统,使宣传部成为“指导精神劳力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相较于前任的消极应付,毛泽东展现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锐气。

在基层组织宣传中,他首创“民俗渗透法”:利用农村婚丧嫁娶等场合植入革命理念,借省长“平民教育”政策开办

20余所农民夜校。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开发“标语+图画+讲演”三维教学法,使农民“如进政治学校”,快速实现思想转化。这种“党内有党”的运作智慧,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形式,又确保了宣传工作的阶级属性。

这段代理任期虽不足一年,却重塑了国民党宣传格局。毛泽东构建的“中央统筹—地方联动—群众渗透”三级宣传体系,不仅为北伐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更开创了“党治宣传”新模式。其将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宣传艺术,成为中共政治传播的重要遗产。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战略眼光与创新能力。(摘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张露璐/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25年,毛泽东在沪

劳模产生于苏区瑞金

1933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团前往瑞金县武阳区,准备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赠旗大会。会上,毛主席将写有“春耕模范”的锦旗赠给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以典型推动夏耕运动。



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福建、湘赣省的妇女代表都来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田、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劳动模范的示范表演。毛主席参加了现场会,他对大家说:“封建社会有种迷信说法,说妇女犁田会遭雷公打,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也可以做到。”毛主席讲话后,给学犁田、耙田的妇女劳动模范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

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近三年的时间里,集中精力抓苏区的经济建设,在工厂、农村等各行各业广泛开展劳动、工作竞赛,形成了学先进促后进你追我赶的局面。在那块红色的土地上,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摘自《工会信息》陈家墩、姚荣启/文)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从春耕到秋收,从男耕到女织,我们的祖先以节日为纽带,将劳动编织进生活的经纬。这些传统“劳动节”既是对农耕时序的遵循,更是对勤劳美德的传承。

提起古代的劳动节,首推农历二月初二。据古籍《帝王世纪》记载,远古时期的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至开春便率部落首领“御驾亲耕”,以实际行动昭示对农耕的重视。《史记》亦载,周武王将此日定为“春龙节”,亲自带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挥锄破土,拉开一年农事的序幕。

唐代,二月初二被官方确立为“耕事节”或“劳农节”,成为古时劳动节的雏形。皇帝率文武百官象征性地参加劳动,农民在农具上系以红绸布表示喜庆。到了明清时期,这一节日的仪式愈发隆重。自雍正以后,每年这天,皇帝带领官员和皇后到专门开辟的“一亩园”扶犁耕种。为鼓励农耕,清代的“劳农节”还规定:“凡七十以上耕者,免赋税杂差,劳农节赏绢一匹,棉十斤,米一石。”

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谷雨,同样承载着劳动的意义。民谣有“清明谷雨两相连,浸

种耕田莫迟延”说法,点明此时气温回暖、土壤湿润,非常适合农业活动。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下,女性也有专属的“劳动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等。传说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夜晚,女孩们聚在一起,在如水月光下摆上供品,对天祭拜,祈求变得心灵手巧,“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即是生动写照。不过“乞巧”渐渐地变成了“斗巧”,成为姑娘们针线活的“PK”赛。由此衍生出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兰夜斗巧等诸多有趣的比赛项目,也展现出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态度。

农历九月初九,古人同样以丰收庆典致敬劳动。朝廷举行庄严的祭天仪式,感恩上苍赐予丰年,祈愿来年风调雨顺、江山永固;民间则盛行晒秋、登高、饮菊花酒等习俗。村落中,玉米、辣椒、稻谷等农作物铺满庭院,五彩斑斓;人们登高望远,俯瞰金黄的田野,在茶香与酒香的氤氲中分享丰收的喜悦,盘点着一年的辛勤耕耘。这是对劳动成果的最高礼赞,也是对土地和自然的深情告白。

(摘自《齐鲁晚报》马晓炜/文)

我国古代就有「劳动节」

那位拿折扇上课的语文老师

六年级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因小升初考试失利,被送去补习班。那时小县城的教育机构还不专业,打着提前教授初中内容的旗号,课本却五花八门,从小学到高中,老师水平更是参差不齐。

上初中语文课的第一天,我们拿到的新课本里大多是文言文和古诗,现代文寥寥无几。正当我们疑惑时,一位清瘦的老人穿着布鞋走进教室。他戴着半框眼镜,手里握着一把折扇,看到满屋闹哄哄的孩子,嘴角泛起笑意。

他自称姓刘,是我们未来两个月的语文老师。他没有翻开课本,也没有使用课件,仅凭一手行草板书,便将几个人物事迹写得工整漂亮。可惜我们这些孩子看不懂,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黑板。他写完便拿起折扇,开始给我们讲起了故事。

他的课堂内容跳脱于课本之外,讲古代却不提李杜,认为这些名气太大,以后自然

会学到。他更愿意讲魏晋风流,聊建安七子,谈竹林七贤。那些名士的名字被他漂亮地写在黑板上,他用扇子一指点,缓缓道来。我们虽不认得这些人,但脑海中浮现出他们抚琴、长啸、饮酒的场景,仿佛魏晋真是那个自由随性的时代。直到几年后读历史书,才明白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混乱的时代,而他们却在其中做着最风流倜傥的事。

他还讲高尔基的《童年》,逐句逐段地讲解一个小孩想和其他孩子玩耍却被家人阻挠的故事。这样的讲解总是花很多时间,常常还没讲完就下课了,让我悻悻而归,仿佛听书听到一半被突然打断。

他热爱讲台,总是笑着上课,却又挣脱课本去讲些更有趣的东西。他认真批阅作文,在孩子们的稚嫩笔迹下写大段评语。即使看到我们上课走神,他也只是巧妙地将劝告藏在戏语中,不经意地敲打一下。

最后一节课,他没有讲语文,而是大方地拿出一百块钱给我们,说:“去买几盒棋下吧。”

买什么棋,不知道;买多少盒,不知道。

我们抱着各式各样的棋回到教室,他告诉我们,喜欢什么棋就下,想学什么棋也可以下。

那节课如何结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初高中的语文老师都会这样上课,所以甚至没有多少不舍,便走出了八月的教室,跨进了九月的初中。

然而,现实并未如我所愿。我的初高中语文老师都很负责,但他们讲课本、讲PPT,花大量时间剖析文章思想与主旨。很少有老师愿意花几十分钟去讲课本之外的风流人物。那些带着历史遗风的故事,再也听不到了。

我无法抱怨什么,分数是首要任务,况且课业也不止语文。于是,我渐渐遗忘

了对故事的追求与渴望。魏晋的故事以未尽的方式,再无音讯。

多年后,我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忽听老师在上面问:“你们有没有听过建安七子啊?魏晋时候的。”没人回答,语文课对理工科学生来说只是好混的公共课。但我突然愣住了,很想抬头听听他讲些什么。然而,他并没有展开,因为这不是重点,而且没人听。此时,那些关于刘老师的记忆如河水逆流般涌回心头。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或许早已忘了那些未讲完的故事,但它们被我们收入耳朵,有的搁浅在记忆的角落,有的则生根发芽,生发出更浓厚的兴趣。

就像我,至今仍执着于那些故事。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翻开一本书,看到“魏晋风流”,又想起那位拿着折扇上课的语文老师。

(选自《青年文摘》2025.4月(上)夏天没有红茶/文)

别放着优点不看

薛曜出身于书法世家,初唐四大书法家中的薛稷和他是堂兄弟关系,褚遂良是其舅祖,父亲薛振更厉害,是唐朝宰相,唐初文士大多出自薛振的门下。受家庭影响,薛曜也酷爱书法。

薛曜主要学习褚遂良的书法,也学习别人的。就这样,几年下来,薛振看着薛曜一点没有长进的书法,不住地摇头。有一次,薛振找到几本孤本,让薛曜品鉴。

薛曜虽然书法不行,但是品鉴功夫很强。他拿起一本孤本说:“横竖笔画过于滑顺,干干巴巴十分呆滞,缺少生态气韵。”

随后,薛曜又拿起一本孤本说:“字体结体过于紧缩向内,结构过度拥挤,不成舒展。”

薛曜拿起最后一本孤本说:“手法十分单一,显得字很直愣矜张,豪放没有做到,含蓄感又被破坏,整体看起来有些奇怪。”

等点评完,薛曜问父亲薛振:“我的点评怎么样?”薛振不停地摇头说:“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好几年书法都没有长进了。就因为你放着人家的优点不看,眼中只有别人微小的瑕疵。你这样怎么能进步呢?”

薛曜大惊,连连承认了错误,随后开始取长补短,经过几十年,终于融百家之长,字瘦硬有神,用笔劲劲,结体疏朗,被后人评为“瘦金体之祖”。

有时,我们总是放着别人的优点不看,吹毛求疵地找别人的缺点,以凸显自己的能力,人变得尖酸刻薄,最终牢骚满腹,一事无成。(摘自《知识窗》任万杰/文)

武后的餐桌



《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于唐哲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当然,不仅造成畜牧产业的损失,也遭到民众甚至官员暗地里的抵制。《御史台记》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可以看得出底下人实际上都在暗地违反禁屠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本来就是杂食动物,吃肉的乐趣若给去了,那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故事主人公是大臣娄师德,当时他担任御史大夫,出差到陕州。吃饭时厨师端上一盘肉,娄师德责问说:皇上禁屠,肉从何而来?厨师回答:这是被豺咬死的羊。娄师德听了一笑:嗯,这豺懂事。于是甩开腮帮子大吃起来。一会儿厨师又端上一盘鲙。所谓鲙就是切成细丝的鱼片,类似今天日本生鱼片的吃法。娄师德又问这鱼肉哪里来的。厨师回答:这

是豺咬死的鱼。娄师德大笑一声:你家豺能咬死鱼?你应该说是水獭咬死的。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右拾遗张德,生了个儿子,摆宴席宴请同僚,私下杀了一头羊,结果同事中有个叫杜肃的悄悄藏了一块肉,回来就向武则天上表举报,说张德违反禁屠令。第二天,武则天见了张德,首先恭喜他生了一个儿子,张德拜谢,武则天紧跟着问:肉从何来?张德一听一身大汗,立即跪倒谢罪。武则天徐徐说:我的禁屠令,限制的是平常时候杀生,家有红白喜事的话不在限制范围内。我劝你一句,以后请客吃饭,你要好好选择一下宾客!然后就把杜肃告状的表给了张德。杜肃羞愧难当,退朝时满朝文武都埋怨他一脸口水。

从这个事可以看到,武则天这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含糊,禁屠令无关宏旨,而揭露奸佞小人可以整肃官场风气,树立个人威望。所以说武则天是个做事极有分寸之人。